

SHIXUE DE TIAOZHAN

现代史学的挑战

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

1961-1988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

王建华●等译

XIANDAI



上海人民出版社



XIANDAI SHIXUE DE TIAOZHAN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

王建华●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 032 2895 2

549770

现代史学的挑战

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

1961-1988



责任编辑 张美娣
封面装帧 邹纪华

现代史学的挑战

——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1961—1988)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

王建华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江苏如东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56 1/32 印张17.5 插页4 字数433,000

1990年10月第1版 199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208—00787—x/K·162

定价 9.50元

前 言

近几十年来，国外历史学经受了一系列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挑战。在迎接挑战的过程中，历史学家的观念，历史学的理论、方法论、方法、解释乃至历史学本身都在发生变化。努力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了解和认识这些变化，沟通和加强国内外史学界的联系，促进和推动历史研究事业的兴旺发展，应当是史学工作者的共同目标。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演说集，正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

从1987年起，在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主持下，我们把编译这本演说集的工作列入了议事日程，并决定成立编译小组，由上海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王建华同志任负责人。编译组成员有（按姓氏笔划排列）：王寅、王建华、朱柏良、朱明权、朱宝雄、杨宇光、何百华、陈丕琮、张启新、姜文彬、费涓洪、顾大信、韩晓燕、葛一峰。在编译过程中，幸蒙美国历史协会、上海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及国内外同行鼎力相助，谨此深表感谢。其中，尤其应提到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武汉大学李世洞同志对编译工作进行了指导；美国历史协会1988年主席、哈佛大学入江昭教授为本书撰写了序言；该会1987年主席、普林斯顿大学纳塔莉·泽门·戴维斯教授和该会执行主任塞缪尔·甘蒙博士，为编译计划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张广勇同志热情参加了审订工作；而上海人民出版社有关同志，则以卓越的眼光为出版此书提供了宝贵的支持。

考虑到我国读者的实际需要和本书的效用，我们一方面对每位演说者扼要作了介绍，对有关演说内容适当加了注释，并增设

了一个附录，另一方面也对若干篇演说中过于冗长的脚注作了压缩，并对极个别演说辞作了必要的删节。限于编译水平，本书不免会有欠妥之处，敬祈各方面专家和读者赐以批评指正。

他山有砺石，良璧逾晶莹。我们希望，本书的出版能与商务印书馆1963年出版的《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1949—1960)》一起，为我国学术界和教育界了解并研究国外史学的现状及演变，提供一部比较完整和系统的文献集。我们也相信，广大读者能以历史的、科学的和分析的眼光来审视这些演说，从而弃其糟粕，取其精华。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

王建华

1989年3月于上海

序 言

欣闻在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主持下，王建华等人已把近几十年来美国历史协会主席的演说译成中文并融为一集，不胜喜悦。

美国历史协会是美国最大的历史学团体。它汇聚了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各个国家和地区及各种方法论的历史学家。从1884年诞生之日起，协会的会员数迅速增加，目前已超过13000人。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加入这个协会。在我们的会员中，既有年高望重的名家，又有年轻气盛的学生；既有高等学府的教师，又有档案工作者和图书馆馆员。更重要的是，协会还有数百名外籍会员；协会的会刊——《美国历史评论》已行销世界各地。

1988年，本人有幸担任了美国历史协会主席。作为该协会主席，我觉得同国内外历史学家进行交往是一件赏心乐事。通过鸿雁传情，我结识了许多学者，他们对学术自由和国际学术交往似乎都怀有一种强烈的义务感。我想，就促进这些目标而言，把美国历史协会年会上所发表的主席演说传播开去，不失为一种非常有用的途径。

每年年底，通常在12月28日，美国历史协会行将卸任的主席都要发表一篇“告别演说”。他(她)们或归纳史学界的现状，或总结历史研究的趋势，或阐述本人所关心的具体课题。读者从这本书中可以看到，美国历史协会的主席有着不同的背景，来自不同的专业，因此，我们很难找到许多共同的主题。实际上，方法论上的多样性，对新的解释持开放态度，历来是美国史学研究、希望也是其他国家史学研究的力量所在。正因为这个缘故，通过

浏览这些演说，读者一定会发觉美国历史学家涉猎的范围非常广泛。读者还会注意到，随着时光的推移，史学界的关注和史学家的兴趣都已几经变化。这是顺理成章的。因为，象其他学科一样，历史学也是一种有生命的学术研究事业，它不能不加批判地接受某些教条。

我非常希望，中国的读者能通过这本书洞悉美国史学的发展过程，尤其是洞悉近几十年来充满生气的、久盛不衰的学术争论。就我个人而言，我欢迎能听到读者的回音。因为我坚信，美中两国之间的学术联系是十分重要的。这种联系的重要性必将与日俱增，并成为加强世界各国之间的关系的重要途径。因此，通过进一步促进中美两国历史学家之间的联系，我们就都为建设一个更友好、更和睦的世界尽了一份力量。

入江昭(Akira Iriye)

美国历史协会1988年主席

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

目 录

前言	I
序言	I
比米斯	美国对外政策和自由幸福1
布里登博	历史的大变异.....18
布林顿	历史研究的多样性.....37
博伊德	应急浅见.....59
莱恩	在共和主义的源头.....83
尼科尔斯	自治文化的历史.....99
霍尔本	思想史114
费正清	七十年代的任务129
伍德沃德	历史的未来151
帕尔默	美国历史协会在一九七〇年173
斯特雷耶	四世纪和十四世纪191
科克伦	历史与文化危机206
怀特	一个研究中世纪的历史学家 对技术评价的态度219
汉克	美国历史学家与当今世界: 责任与机遇233
赖特	历史是一门伦理学258
莫里斯	“我们美国人民”:人民革命 二百周年纪念273

吉布森	征服、投降与印第安条约	300
鲍斯马	文艺复兴与西方史学的戏剧性	317
富兰克林	美国人的镜子：一百年来的 重建史学	339
平克尼	美国历史学家论欧洲史	359
贝林	现代史学的挑战	386
克雷格	历史学家与国际关系研究	424
柯廷	深度、广度和相关性	440
林克	美国历史协会一百年：回顾与展望 (1884—1984)	452
麦克尼尔	神话—历史：真理、神话、历史 和历史学家	475
戴格勒	美国史求索	489
戴维斯	历史学的两个主体	505
入江昭	历史学的国际化	530
附 录	美国历史协会历任主席演说题录(1884—1960) ...	543

美国对外政策和自由幸福

塞缪尔·弗拉格·比米斯*

当历史学家在为历史哲学而争论,哲学家在探究历史的意义、甚至意义的意义时,我们大多数人难道就不能一致同意,历史研究的一大特点是有一个确定的用途吗?历史研究的主要作用是回顾我们的经验,包括个别经验和普遍经验,使之超越我们的有生之年所及,使我们在对待和衡量(我不说决定)未来的希望时加强我们的判断。当然,我们的历史经验须通过批判的学术研究加以证实。另外,在我们走向未来时,还须根据这种经验与不断变化的现在之间的关系反复给予最新评价。象一切社会过程一样,对外政策的演变和实践也是在时空领域内发生的,就合众国而言,似乎是在扩展的空间和缩短的时间里发生的。不过,尽管它在时空领域内发生,仍须根据人类的价值观念加以衡量。

我们在面对今天的问题时——包括民族存亡和我们所主张的世界原则等重大问题——合众国的外交史能否加强我们的判断

-
- Samuel Flagg Bemis (1891—1973), 美国外交史专家,为美国外交政策作辩护的“理想主义”学派代表人物。哈佛大学博士(1916)。1920年起先后任惠特曼学院、华盛顿大学和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1945年起为耶鲁大学美洲关系史教授,1960年起为名誉教授。著有:《平克尼条约》(1926)、《约翰·昆西·亚当斯与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础》(1949)、《约翰·昆西·亚当斯与联邦》等。这篇演说发表于1961年在首都华盛顿举行的第76届年会,载《美国历史评论》,1962年第67卷,第291—305页。译文略有删节。——编者

呢？只有当我们把历史经验同世界政治和世界权力的若干连续阶段联系起来考察时，答案才是肯定的，因为在这个背景中，美国外交无论如何已开展了近两个世纪；还有，只有当我们根据我们这个民族的基本生活目标和价值，根据我国人民维护这些目标和价值的决心来衡量美国外交史时，答案才是肯定的。

近来，我们听到了诸多议论，如必须要有民族目的，必须为美好的生活而树立民族的目标等等。好象长期以来，《独立宣言》所说的原则——“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我国宪法序言所说的原则——“建立更完善的联邦，树立正义，保障国内安定，增进一般福利，确保我们自己和子孙后代永享自由幸福”，都没有能阐明这种民族目的。

宪法中这段基本的陈述说明了我国民族最初赖以存在的理由。用伦纳德·克里格论述卡尔·马克思的话来说：“在各个时期，人类最为关注的那些活动，即他们认为最重要的活动，赋予其他活动以基调和色彩。”^①在我国民族的肇始阶段，赋予我国人民的种种活动以基调和色彩的东西是自由。“自由幸福”是“英国人”的基本“权利”。这些权利发轫于殖民特许状，^②并在17和18世纪美洲宪法惯例中得以发展，而这些惯例本身则来自1688年英国议会制订的《民权法典》。个人享有这些自由是一种价值观。合众国在其全部历史中，在权力政法结构不断发生变化的世界民族之林中，都代表了这种价值观。我们今天要求全体公民奉行的就是这种价值观。从不同程度上说，世界上各个自由国家所奉行的也是这种价值观。阿尔贝·卡米在临终前不久写道：“对我们来说，在我国的

① 克里格，《马克思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载《政治学季刊》，1960年第75卷，第360页。

② 英国国王为促进在北美进行殖民活动颁发了一系列特许状（colonial charters），规定殖民地开拓者享有英国法律载明的各种权利，但殖民地统治权归英国国王。——编者

全部历史上,这些价值观都是旨在反对奴役、谬误和恐怖。”^① 这些价值观乃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自由权利;如古老的赞美诗所云,“法律,自由及信仰上帝,乃时代的丰厚赏赐”。

作为一个民族,我们迄今并不缺乏明确的目的。我们缺乏的似乎是未能持久地意识到这个目的及天赋的“自由幸福”。在美国的防卫和外交战略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时刻,我们正在丢失的似乎是不惜任何代价使之发扬光大的坚强意志。就我们所憧憬的美好生活的目标而言,这些目标取决于自由的存在。

就象在漫长的地质学年代,地球通过板块运动给各大陆的数量、结构、性质、气候、生物等带来了必然的变化,因此,在较短的人类史上,全部国际关系史上力量平衡的变化,也影响了各国和各国人民的数量、结构、特征及政策。各国政府不得不适应这种地缘政治变化,不然就会在民族纷争中走向衰落。就象地质史上的变化一样,迄今为止,这些时而渐进,时而突发的革命性变化一直是外交史学家的路标,它们象地壳地层帮助地质学家那样帮助着外交史学家,使他们能告诉我们作为一个民族来自何方、到过何方、现在正处于何方,也许(仅仅也许),他们还能告诉我们将由此走向何方。

我认为,美国外交史可分为5个重要阶段,或者说发生过5次重要变化,它们的形成过程或者缓慢或者突然,它们可以引起在座诸位的注意。这五个阶段是:美国革命以前欧洲国家制度得以产生的3个世纪;急风暴雨般的1776—1823年的革命和解放时代;1815年以后的一个世纪的孤立和安全;19世纪末出现的、作为20世纪世界大战前奏的权力政治新格局;以及从迅速发展的原子时代开始的、目前正在进行的冷战。

地缘政治的第一次重大变化是从地中海转到大西洋。对此,研

^① 卡米:《叛逆》,纽约1959年,第233页。

究美国对外政策的史学家需予以关注,但我在这里只需提一下。这次变化导致了新世界的发现和殖民化,与此同时,随着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等民族国家的出现,大西洋沿岸形成了新的欧洲体系。我们可以把1492—1776年归结为欧洲王朝和殖民战争时期。在这个时期行将结束时,美国在法国盟友的支持下揭竿而起,反抗英国宗主国并赢得了独立。

我国的民族独立导致了权力结构的第二次重大变化。“解放时代”包括西方世界发生的三次激烈的政治革命,即北美革命、法国革命和拉丁美洲革命,以及由此引起的一系列战争。

由于大不列颠和西班牙必须应付法国革命战争,这就使华盛顿总统——那位明智的、远见卓识的、有着良好判断力的爱国领袖,他的思想也许并不敏捷,但他决不是某些人所说的是“手足无措”或年老体衰的政治家——得以维持美国的中立,并通过1794年与大不列颠签订的条约,把美国旧西北的领土从英国占领下解放出来,^①又通过1795年与西班牙签订的条约,^②开辟了密西西比河至墨西哥湾的航路,把旧西南从西班牙占领下解放出来。这两个条约是新生的国家政府最早通过谈判而签订的条约,而“国家”一词则是乔治·华盛顿的口头禅。

美国摆脱了欧洲的旋风,还意外地得到了其他重要的收获。在杰斐逊当政期间,出于欧洲局势的直接需要,拿破仑·波拿巴不得不放弃在密西西比河谷重建法国殖民帝国的计划。结果,借用爱德华·钱宁的恰如其分的话来说,美国“获得了路易斯安那”。在《独立宣言》发表25年之后,美国的疆域在一夜之间翻了一番。

① 即《约翰·杰伊条约》。——编者

② 即《圣洛伦佐条约》,该条约把北纬31°定为西佛罗里达(属西班牙)与西佐治亚(后为密西西比准州)的边界,从而确认了美国人在密西西比河上的航行权。——编者

拿破仑对西班牙利益的侵犯造成了拉丁美洲革命的前提。为使美国在西班牙殖民战争中保持中立，并奢望阻止北美共和国承认南美的新兴独立国家，斐迪南七世在复辟专制后于1819年同美国签订了所谓“横贯大陆条约”，把佛罗里达置于美国的国旗之下，并明确承认——这是外国第一次承认——美国在太平洋沿岸拥有主权地位。此后不久，由于考虑到欧洲干涉拉美的可能性，门罗总统独立发表了宣言——这个宣言无疑假着英国海军战舰的威风，但也闪烁着德克斯特·珀金斯所说的“勇敢的共和色彩”。

这些令人愉快的辉煌成就，并不是在美国对外政策奠基者所希望的中立框架内取得的。在欧洲发生的一般战争中，我们从未完全享受到中立。无论如何，当这些战争扩展至大洋时，它们就不再是乔治·华盛顿在告别演说中所谈到的、严格限于本土的“一般”战争了。在获得独立以来的半个世纪中，美国的中立立场破产了两次；而在本世纪上半叶，这一立场又崩溃了两次。

但是，即便在标志着前两次破产的两次战争中，合众国也没有寻求与敌人的敌人结盟；在1798—1800年的反法“准战争”中，它没有与大不列颠结盟；在1812—1815年的第二次对英战争中，它没有与拿破仑结盟。我们的父辈在法国革命时曾被牵扯进挽救芸芸众生的同盟，这些经验加强了他们的厌恶感及其子孙的不信任感，使他们不愿意再加入任何纠缠不休的同盟。这种不信任感主宰了美国在日后200年世界政治中的对外政策。

总的来说，在开国政治家的领导下，新确立的政策还算成功地对解放时代的国际政治作出了反应。

根特和维也纳和谈^① 预示着我国地缘政治的重心又一次发生

^① 分别指1814年底英、美为结束战争而签定的《根特条约》，和1814—1815年欧洲各国在拿破仑帝国瓦解后签订的《维也纳协议》。——编者

了变化,它开始横跨美洲大陆——从大西洋移向密西西比河谷,进而移向太平洋。在接踵而来的一个世纪的孤立中,一支最小规模的常备军维护着一个扩展中的国家的安全,这支军队仅足以平息动乱并统治印第安部落;而海军规模相应地也很小。美国的武装力量甚至还比不上最小的欧洲强国。当然,我不是指在墨西哥战争或区域性的南部独立战争时期^①所临时集结的陆军和海军,因为一俟冲突结束,这些武装力量便被遣散了。

除维持联邦以外,美国人在19世纪最大的成就是民族扩张,即穿过大陆的空旷土地,到达“另一个海洋”^②的海岸。这种扩张为合众国在今天成为大国和自由的堡垒奠定了领土基础。由于欧洲的历次战争及其在旧世界和新世界的余波,加之欧洲敌友之间的不断冲突,合众国得以在根特和维也纳条约签订后几乎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又将其版图扩大了一倍。C.范·伍德沃德教授十分精辟地把这段向大陆扩张的时期称作“自由安全”时期。正是在这个漫长的、海洋上比较和平的时期,美国才得以贯彻、并基本上实现了对外政策的崇高目标。

这个横贯美洲的共和国在趋于丰满的过程中,除了一次突出的国际性战争外,在1783—1867年间都是令人愉快地通过和平外交来完成其扩张的。我想,格朗德河两岸的人一般都会同意,如果双方当时能暂守本世纪墨美之间、美洲国家之间和联合国的和平机制,1846—1848年的美墨之战——这并不是这一时期美洲国家之间发生的唯一战争——或许是可以避免的。美国的许多历史学家,以及从约翰·昆西·亚当斯、威廉·杰伊、亚伯拉罕·林肯到伍德罗·威尔逊、贾斯廷·史密斯和尤金·巴克等政治家,都曾辩论过与墨西哥作战的正义性,但谁也做不到完全客观。然而,今天

① 指1846—1848年的侵略墨西哥战争和1861—1865年的南北战争。——编者

② 即太平洋。——编者

我无法找到任何美国人一方面批判波尔克总统的对外政策及日后的内战，另一方面又想通过《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①和其后的“加兹登购买”^②而得到的土地归还给墨西哥。1917年，当齐默尔曼在电报中公开建议德国、日本、墨西哥联合起来夺回“失去的省”时，这项建议煽起了多么激愤的民情！^③

合众国之所以在18和19世纪轻而易举地取得成功，其原因有：我国处于“超然和相隔遥远的位置”——借用华盛顿告别演说中的众所周知的话；欧洲的扰攘不安成了美国的有利条件，我国早期的政治家肯定已觉察到这一点，而今天的历史学家则更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加拿大的地位：它最初实际上是在不列颠世纪实现英-美和平的保证，后来在动荡的20世纪则是英美团结和联合友好的产物。此外，还有一些更有利的因素，也使美国人对加拿大的地缘政治倍觉亲切。文化上的共鸣，人口上的亲近及经济上的关系，把美、加两国人民联合起来并日益走向和平。加拿大人民历来爱好和平，他们自己从不备战。毫无疑问，他们或他们中的任何一大部分人都从未挑起过与合众国的战争。

因此，在19世纪的后75年中，美国从其直觉出发的对外政策轻而易举地适应了极其有利的世界政治格局。我们感到如此安全无恙，以致我们常常不需要过多的策略。有些自作聪明的人甚至认为，我们在国外也不需要外交代表。啊，真是妙不可言的世纪，我们的民族竟是如此意外地幸运！啊，快活的、黄金般的、已经逝去的安全岁月！我们纯真无邪而又福星高照，我们超脱了周围的世界！

19世纪时，即从1815年起，我国民族的危险来自内部。我们居

① 1848年2月2日订立，规定墨西哥把得克萨斯、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割让给美国。——编者

② 在皮尔斯总统任内完成，要求墨西哥割让基拉河以南的大片土地。——编者

③ 指一次大战时德国国务大臣齐默尔曼发给驻墨公使的电报，后由英国截获交给美国。——编者

然能够举世无双地纵情于一场大规模内战，却又未给我国的对外政策造成任何永久性损害，这难道不是合众国处境安全的最简单不过的说明吗？但是，在我们处理本世纪的问题并权衡未来的希望时，上世纪的外交经验能否加强我们的判断呢？

在19世纪90年代的历史“分水岭”前，快乐的孤立时代和北美大陆的心满意足状态接近了终点。美国对外政策和外交轴线的第四次重大的地缘政治变化，是从东西转到南北，转到中美洲和巴拿马地峡及其两洋外围岛屿。

19世纪末，世界政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现象，即突然出现了三个新兴的世界性大国——德国、美国和日本，从而促使了上述变化的发生。其中，两个国家各有其第一流陆军，并都在建立第一流海军，它们对第三个国家——美国——以及正处于颠峰状态的大英帝国来说，都是极其严重的不祥之兆。

德国和日本都没有加拿大这样的友好国家来充当与美国进行和平交往的保证；相反，美国在1867年取得阿拉斯加后，却使日本在后来有了一份抵押，而美国在1898年接管了菲律宾群岛，则使日本立即又有了一份抵押。日本很有可能威胁阿拉斯加和菲律宾；还可以想象，德国也有可能威胁我们的大西洋沿岸和加勒比海。为应付这些可能，美国将依靠其新建的一洋舰队在太平洋迎击德国（万一英国保持中立），或在太平洋迎击日本。为迎击两方面的来犯者，把美洲运河置于美国的控制下就变得迫在眉睫，以便在必要时沿着这条水路通道，让海军从一洋驶往另一洋。在19、20世纪之交，任何人，甚至包括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在内，做梦也想不到要同时在两洋作战。

人们也许能感觉到，正是巴拿马地峡问题在1898年鼓起了扩张主义者的激情。扩张主义者发现，公众在古巴问题上的歇斯底里很能迎合他们的“大政方针”，即在战略上确保对未来运河的控